

【中图分类号】G728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7-2179(2007)04-0004-05

远程高等教育与政府、大学、市场的关系

——本刊记者与保罗·克拉克教授的对话纪实与思考

路新民 魏志慧

时间:2006年11月16日16:30-17:30

地点:上海远程教育集团“学习广场”圆桌会议厅

记者:《开放教育研究》编辑部 路新民、魏志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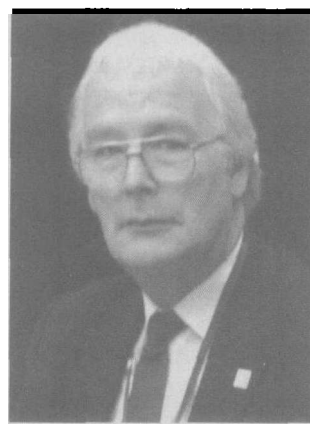
对象:英国开放大学教学副校长 保罗·克拉克教授

翻译:上海电视大学外语系 张轶斌

背景 克拉克校长是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远程教育教席、上海电视大学校长张德明教授的邀请,参加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全委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远程教育教席/上海电视大学联合举办的“2006远程教育国际系列研修班”并做主题学术演讲报告的远程教育专家。克拉克教授来自世界远程教育人仰慕的英国开放大学。这是一所在全英110多所大学教学质量排行榜上排位第五、在学习支持服务方面连续两年排位第一的非传统教学大学。作为主管教学副校长的克拉克教授,此次前来中国的上海,自然引起中国远程教育人的极大关注。1969年诞生至今不满40岁的英国开放大学,为什么能在世界高等教育最发达的英国大学傲视群雄?为什么先于其诞生并实践近50年的中国远程教育至今除规模举世无双堪称世界第一巨型大学之外,其他全都无足挂齿?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的远程教育,包括中国广播电视大学、中国高校网络教育学院以及大学教育信息化发展进程的举步维艰?改革与开放的30年,中国高等教育(包括中国高等远程教育)究竟改革了些什么,开放了些什么?为什么作为生存与发展生命线的教育教学质量始终得不到包括国人在内的世人认可?除了具体的教与学的理念、思想、技术和方法,是否存在隐藏于其背后的办学体制问题?这些困扰我们学术人多年的问题,在采访前中午的餐桌上,我们向克拉克校长抛出了让其思考并作回答的三个关键词,即开放大学与“政府”、“大学”、“市场”的关系。

16:30 当天下午的会议结束,我们即在圆桌会议厅内他的坐席两旁,围绕着如上问题式的思考,与克拉克进行了简短而意味深远的一次学术对话。

路新民:非常感谢您 UNESCO 远程教育国际研修班期间接受 Open Education Research 的采访。我们知道您从2002年起就担任英国开放大学主管教学和学习的副校长,尽管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这四年的时间并不长,但经验的积累与形



成,我们相信是与您所供职和服务的一流大学的环境

相关。您可能对中国国情有些许了解。我们所说的国情,不仅是指看得见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发展现状,更重要的是指看不见的藏于社会现象背后的传统文化思想和传统社会制度。这些根深蒂固的东西,使得中国人至今仍坚定“西医治标”、“中医治本”的疗效理念,所以,人们更希望走自己的“中国特色”之路。

中国与英国,两国的社会制度存在着根本不同。社会制度的不同影响着两国教育制度的迥异。70年代末,小平同志访英从希思首相那儿了解了开放大学的诞生与发展以及对社会的作用之后,特别批准建立起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随后在中国大地如雨后春笋,各省市自治区也纷纷建立起了广播电视大学,仿效英国开放大学实施国家远程教育。可以说,在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与政府的关系一直很好,因为中国电大是政府要办的,凡事都由政府做主,所以,这个系统也是中国最大的一所“官办”大学。但是,经过20多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中国远程教育出现了很多过去从未预料的新问题,但中国远程教育人依旧寄希望于政府。因此,我们很想了解一下英国开放大学和英国政府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

克拉克:正如你们所说的,我不是很了解中国国情尤其传统文化思想,所以我也很难为中国远程教育开出你们所不能相信“治本”的西医药方。可以说,英国开放大学和英国政府的关系,与其他英国高校和英国政府的关系是完全一样的。这种关系不能用好与不好给予表述,而是1969年开放大学成立时的“皇家令”所赋予的与所有英国大学同等的权力。英国大学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一个中间体,即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简称 HEFC)来获得政府的资助,而不是直接得到政府的资助。同样的道理,英国开放大学要想获得政府的资助,必须首先获得质量保障总署(Quality Assurance Agency,简称 QAA)的教学质量评估及 HEFC 对其办学质量的认可,方能与英国其他大学一样以同样的方式从英国政府那里获得各项基金。在这方面,据说中国的大学,包括中国的开放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可能更直接。至于英国开放大学教什么内容以及怎么教,与英国的其他大学一样,都是绝对独立的,从不

受制于政府的直接控制。就像我在下午的报告时提及的,我们拥有颁发学位的权利,这是由政府部门或皇家宪章规定的。按照皇家宪章,英国开放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英国其他任何一所大学一样,以独立办学实体的方式运作至今。

路新民:独立办学实体,这个名词我们并不陌生。在中国,《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都是独立的办学实体,但是在运作上却令中国的大学校长们望而却步、可望不可及。这可能是《高等教育法》不尽完善的地方,或者是目前国情的使然。按理,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包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广播电视大学也都是独立办学的法人组织,与所有“国立”和“省立”大学一样都是具有独立办学实体资质的法人机构。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诞生的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形式上独立的省级广播电视大学在系统内始终处于非独立的教学机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受控于国家政府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省级广播电视大学受控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同时也要受控于当地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由于受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固有体制的影响,真正的完全意义的独立办学实体对于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来说很难在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下得以体现。比较英国开放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和政府的关系,除了资金上的依赖,更主要的是在教学方面,包括教学大纲、教材、考试、命题等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五统一”,完全受控于中央,地方权力在这方面是少之甚少。此外,广播电视大学系统的招生也是由国家来控制的,当国家需要扩大招生规模的时候就允许扩招,但是当国家限制招生的时候,就会控制电大的招生。中国地域辽阔,区域经济和区域教育发展极不平衡,不顾及区域社会经济差异的国家教育集权是制约地方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根源之一。英国国土面积比中国小得很多,区域经济发展比较均衡,教育集权相对比较适宜英国国情。但是,作为独立办学实体的英国开放大学,除了在办学资金方面也需要依赖政府资助外,在办学上又是如何运作的呢?我提出这个问题的真正目的,是想了解英国大学在办学领域是否受控于中央政府?

克拉克:不!英国开放大学与英国的其他所有大学一样,完全能够自主决定设置本校的专业与课程。开放大学的所有教学行为,尤其所有学科的学位授予包括学士、硕士和博士必须满足 QAA 的要求,如按照相应的基准设置学位,并遵循这种中等自治或要求。政府不必制定统一的考试,每所大学均有权设定自己的考试科目和内容,但是所有大学的考试都必须能够符合 QAA 相应的基准,这确实很难做到,也难以鉴别不同的实践。但是,正是难以做到的事情我们做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开放大学与英国的其他大学是没有区别的。这显然不同于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即 44 所具备独立办学实体的地方广播电视大学非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我不是很了解的“五统一”教学原则。此外,英国开放大学在教学质量保证方面,即控制链的任何一个环节,包括认证框架、实践流程、机构审计、基本标准、专业规范、教学信

息等诸方面,都与英国其他所有大学一样按照 QAA 要求的相同方式运作。过去 35 年中,通过学生的能力和毕业生的成就,英国开放大学建立起了在全英高等教育中的良好声誉。但是在 25 年之前,英国民众还普遍认为开放大学并不是按照与传统大学相同的标准运行的。随着英国开放大学全体教职人员的共同努力,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我们都拥有了与其他大学一样的地位。英国和中国一样,有一些已建立良好声誉的大学,如剑桥大学、伦敦大学、沃里克大学、爱丁堡大学等,就像中国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一样被认为是本国大学中的佼佼者。但是就总体而言,与上述的传统大学相比,英国开放大学经过多年的发展,提供了即使不是最好也是同等质量的教学和支持。报纸上所公布的第三方机构发布的大学排名系统显示,英国开放大学在教学方面全英排名第五,通过对全英所有大学的学生的调查表明,我们的学习支持服务已经连续两年排名全国第一。

从另外一个不是太正式的方面也能表明开放大学教学优良的例子,即有很多传统大学的老师复制了我们的教材并在他们的课堂上使用,而且这样的现象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路新民:在“2005 远程教育国际系列研修班”上,我从英国开放大学的阿兰·泰特教授那儿得知,英国开放大学主办的《开放学习》杂志的前任主编几年前就应聘去了剑桥大学任职教授。这使我思考,如果在中国,一所广播电视大学主办的期刊主编受聘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任职教授,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因为在中国,广播电视大学是所不入流的大学,说她是所大学,其实是政府对她的宠爱和抬举。有政府官员曾开诚布公的指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就是中国政府的远程教育机构,地方的广播电视大学就是地方政府的远程教育机构。如此认识,按此理解,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就是一所为政府实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继续教育社会化的远程教学机构。所以,中国远程教育的办学层次不可能有独立的高学位的办学权和授予权,与其相对应的教师教学素养和科研素养,也不可能与普通高校的教师素养相提并论。广播电视大学与普通大学的差异,决定了教师之间的差异,而这种教师之间的差异又决定了广播电视大学的教学质量不可能与普通大学处于同一起点。尽管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属于世界开放大学的阵营,其规模也为世界之最,但领袖却不属于中国、而属于英国开放大学,这是世人公认的。您认为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是什么?在我的认识中,教师是关键。您是否认同我的这一观点?

克拉克:这个问题很难做出判断。我不太了解中国具体的教育方式,尤其是开放与远程教育的运作方式。由于中国和英国文化背景的差异,因此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方面两个国家也有所不同,例如,在中国,教师如何辅导学生,什么是学生正常的学习行为等等方面和英国的师生交互方式肯定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我也难以做出一定的比较。但教师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至高无上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英国开放大学系统拥有 8000 名兼职的辅导教师,这

些辅导教师给学生提供指导,并给予学生非正式的支持。这是我们之所以成功的核心因素之一,很多学生认为辅导教师确实有助于他们能够坚持学习,并逐步向前发展。我在下午的报告中说过,英国开放大学拥有近万名的专兼职教师,专职教师的职责不是在教书授课,而是全攻专业、课程、教学的设计与开发;一旦获准定型,具体的教学任务全由兼职教师负责实施。在开放大学,兼职的辅导教师全都分布于各地的学习中心,他们不需要有很高深的学术背景,只需按部就班地照本宣科,提供学生最满意的非正式支持就行。从我们的经验中感到,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是不可分割的确保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大家都知道,英国开放大学的在校学生总量是20万左右,按照我们现有教师的数量,生师比率是20:1。上海电视大学副校长陈信教授在报告中提到,中国远程教育的生师比是50:1。在英国,通常情况下的生师比率还要小得多,或12:1或10:1。这就说明,英国开放大学的辅导教师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帮助学校和学生解决更多的教与学问题。教学质量排位全英大学第五,学习支持服务排位全英第一,充分说明了英国开放大学的专兼职教师的体制、机制、结构,是保证开放大学运营成功的关键因素。

路新民:我相信,英国开放大学这几年接待来访的中国学者不计其数,但把经验带回来的也不少,而把经验真正学到手的几乎没有。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前些日子,一位中国学者刚从英国开放大学访学归来,她说,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与英国的开放大学根本不是一类大学,我们过去总把这两所大学归于同类大学,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英国开放大学与英国的其他大学同属于普通大学,除了在教学方式上使用远程手段,其他所有的一切均与普通大学一样。正如您刚才说的,“教学的所有行为”均与英国的所有其他大学执行完全一样的标准。我以为,这可能就是中英开放大学的本质上的差异。尽管如此,在英国社会,开放大学的教师地位与普通高校教师相比,是否存在高低贵贱的差异?而在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的教师地位决不是低一些,而是低很多。这是否与我们教师的教学与科研素养相关?

克拉克:我相信,这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在英国,开放大学的学术人员和其他大学的学术人员一样,以同样的方式从事着教育与研究工作。每位教师通过他的出版物、所获得的研究资助、在会议上所做的报告等来确定其在所属学术团体中的地位,这种机制同样适用于英国开放大学的学术人员。我认为,开放大学的教师从事的是一项有意义的、有难度的工作,他们需要设计与开发课程材料,还要研究如何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学习支持服务。因此,我认为,我们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机会也能很好地反映出我们的教师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们才是真正付诸实践的人,而且这样的工作经常是费力的、累人的。正如你我在前面交流中所说的,不仅我们所设计与开发的课程材料被其他大学的教师所使用,而且我们的教师离任后也被其他大学所聘任。这说明在英国,开放大学的教师与其他大学的教师,是没有高低贵

贱之区别的。但是在25年之前却不是现在的情景。那时,开放大学的教师与开放大学一起,都不被社会看好。现在的情形却不是这样了。这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路新民:我很欣赏你们的这种职业态度。世界是靠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打造出来的。在中国远程教育期刊领域,我们有着切身的体会。市场无大小,机遇无先后。中国的期刊市场也是如此。五年前的《开放教育研究》杂志,在中国期刊市场所能占的份额,无足轻重,其影响因子是0.000,五年后的今天却达到了1.116,在CSSCI检索系统,排位教育学类第17,教育技术学类第2,远程教育领域第1。我们的体会是,遵循市场规则游戏,按照市场规律办刊,惟靠质量赢得市场。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全国的远程教学机构也不下百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偏偏把包括日本、韩国、朝鲜、蒙古等东亚地区的远程教育教席给予上海电视大学的校长,也充分说明任何一所大学(包括远程教学大学)的发展都离不开市场,尤其在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下。中国加入WTO已经六年,融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合作,发展自身的同时发展世界,是中国包括高等远程教育眼下亟需面对的重要现实。但是,由于受长期的惯性思维影响,我们的市场观念和行为时有时无、时隐时现。近几年,中国高等教育在扩招的同时也带来了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困境。国家政府研究中心的专家在接受北京主流媒体著名栏目主持人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大学教的是社会基本不需要的,而社会需要的我们的大学又是基本不教的”。所以,我十分想了解英国开放大学与市场的关系?主要想了解开放大学的专业、课程、教材与市场的关系究竟如何?在中国,很多专业、课程、教材与市场脱节得很厉害。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英国开放大学的教学质量在全英国排名第五,学习支持服务连续两年排名第一,你们在这方面又是如何做的呢?

克拉克:我很赞成你的观点。在英国开放大学,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了解市场发展的特定规律,即社会需求,所以我们才能够开发出引领质量和需求发展方向的课程和学科。在过去的五到七年,我们努力拓展自己的视野,开发出了大量相关专业发展前沿领域的课程,例如社会工作、护理认证、商务研究、老年人专业发展、教师培训,有些课程已经运行了15-20年,而且现在发展得依旧不错。目前,我们还处于不断拓展的发展之中,英国开放大学有个特定的领域与企业合作,并向企业学习,我们所开发的课程涉及到小的课程、特定的课程、在小课程中使用大部分内容、粗略开发和发送的课程,一直到标准的学术课程。我们有一个继续专业发展中心,该中心致力于与企业和合作,满足企业的特定需求。

关于市场方面的问题我还想补充一点,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拥有大量的高端课程,但选修这些课程的学生却很少,其学生数量自然无法与那些低端的拥有大量学生数的课程同日而语。因此,如何维持这些只有15-100名学生选修的课程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难题之一。但现在这方面正在发

生一些新的变化。如果你能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发送教学材料从而降低成本,你就能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我们现在能使那些只有15名学生选修的课程变得赢利,这在十年前,是很难做到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信息通信技术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看待这类课程的视角,你可以将课程打包,控制成本,同时你仍然可以获得新的赢利空间。现在,我们正在思考这些思路,从而促进那些选修学生数少的高端课程的发展。

17:40 宴会厅来电,催我们与保罗·克拉克教授的访谈必须立即结束,因为所有参会代表们都在等待着这位来自英国开放大学的贵宾。受时间限制,我们与克拉克教授的对话不无遗憾的暂告中断,但英国开放大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踪迹,我们将会继续给予特别关注,以飨给予本刊特别关注的广大读者。

秋天,是大地万物收获的季节。2006年的秋风,吹来得特别的晚,滞留得也特别的久,似乎在给辛劳一年的人们特别长的时间,去思考春耕与夏锄带给我们的得与失。

路新民:研修班前后,我先后会晤了五位广播电视大学的校长,话题始终围绕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与“政府”、“大学”、“市场”的关系而展开。无独有偶,在审读本期刊载的《中外政府与高校权力博弈模式比较研究》之文章中,著作者认为,在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着三大权力主体,即“政府”、“高校”与“社会”。这里,作者把“社会”看成是市场,社会和个人的统称,而“政府”则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这简直就是一种不谋而合。我之所以为这次对话定下三个关键词,或称之为三个命题,就是基于中国的远程教育教学机构受制于国家教育体制而尚未正确处理好的这三个关系,最终直接导致中国的远程教育30年始终徘徊在似远程而非远程、似开放而非开放、似大学而非大学的尴尬窘境。应该说,这三个“似是而非”是形成我们向克拉克教授领教英国开放大学与上述“三个关系”的出发点。

远程教育对于世界各国教育的发展都是重要的,但是各国的远程教育又各有自己不同的具体做法,很难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应用于本国的实践。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不能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照搬他国的经验,而结合国情借鉴他国的经验,“他为己用”,则是任何一个国家尤其发展中国家必须的国策,否则就不能也不可能获得国家的科学发展。

1)关于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前不久,一位曾在政府机关工作过的广播电视大学校长与我说,外国的远程教育确实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但中国毕竟有自己的国情,有自己的体制,更重要的是我们毕竟生活在自己的国度,所以我们考虑任何问题、做出任何决策,都不能离开中国的国情和体制去盲目学习。中国远程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是这样,不能离开国情和体制去盲目学习他国的经验。而在我看来,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的六年来,中国的经济正在并已经与世界经济融合,而中国的教育却始终未能敞开

国门,尤其最可以也能够与世界教育融合的远程高等教育贸易。英国的诺丁汉大学虽在宁波落户,但那只是教育部特准的个案,中国的远程教育为何不能先于中国的高等教育首先改制?为何不能根据市场体制的环境首先摆脱计划体制的束缚而引进世界发达国家的远程教育理念和模式,进而输出教育?总之,我在回答校长“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出现危机的根本原因”时认为,就是体制。而体制的原因导致中国大学受制于政府过多,尤其广播电视大学,不能根据市场的需求自主办学。众所周知,英国开放大学是世界远程教育的旗帜,而真正在市场体制环境下运作成功的是美国的阿波罗国际教育集团旗下的凤凰城大学。比较而言,中国的国情更愿意接受前者的经验而排斥后者,因为后者更多的是商业运作的理念和模式。我们也知道,英国的经验,尤其开放大学与英国政府的关系,这种国家体制不是不能为中国“所用”的,比如说英国政府对大学教育的拨款是根据第三方对大学的评估结果决定拨款多少或不予拨款,这个第三方的评估机构在政府与大学之间的体制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本刊(2005年第4期)曾给予过介绍,但却未能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需要的是,这种体制(或与政府的关系)对英国开放大学发展带来的最直接的作用和好处,目的在于让中国的远程教学大学领导者明白要使自己得到发展,政府支持是必须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体制做保证。这是我在对话后所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即与政府的关系问题。

2)关于与大学的关系问题。中国远程教育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各国开放大学熟知的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说其是个系统,是因为除了国家层面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之外,还有30个省一级的广播电视大学和14个中心城市广播电视大学。44个省级广播电视大学尽管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都具有独立法人的资格,但在教学教务管理等业务层面则受制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这是一个1979年建立于计划体制下的庞大的教学系统,在教学上主张绝对的“五统一”。另一个是1998年之后在67所重点大学试点的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即在母体大学内建立的面向全国招生的网络教育学院。相比较而言,网络教育学院尽管有“全国高校现代远程教育协作组”协调,但比较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来说,还是属于松散型的系统。中国的这两大远程教育系统,与普通大学的关系,广播电视大学则更具有排他的独立性,很少有与普通大学的合作与交往,而网络教育学院虽隶属于母体大学,但在普通大学内部则也属于边缘教学机构。两类远程教育机构都声称可以集合国内一流大学的教学资源,但一流大学的教学资源却很少为远程教学机构共享。当然,由于两类大学的特质不同,也很难实现共享。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关键在于中国远程教育没有自己的不同于普通大学教师的一支教师队伍。计划体制下,普通大学可以支持广播电视大学;现在处于市场体制的环境下,谁能为他人无私奉献个人或本校的知识产权?所以,处于缺乏优质远程教学资源的远程教学机构,尤其广播电视大学,危机四伏。这种危机在各个层面、

各种类型的远程教育机构中尽管各有不同的表现,但对优质远程教学资源的匮乏,以及困惑未来发展的担忧则是共有的。尤其湖北广播电视大学,2006年生源的急剧下降(是上海的五分之一、浙江的七分之一),已经使他们处于一种生存底线的危机。据悉,某中心城市广播电视大学也因生源的急剧下降将不得不考虑撤销大学建制而改为远程学习中心,即服务于社会任何需要服务的教育机构。如果说,这是中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崩溃危机之信号的话,那么关于这个问题,除了体制原因外,与普通大学互不交往的关系,我以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英国开放大学所以能在全英100多所大学中教学质量排位第五,拥有自己的优质教学资源是关键。而且,他们的资源可以输出其他大学,他们的教师可以受聘其他大学;当然我相信,他们也会聘用其他大学的教师为自己的教师。这种大教育观、国家观,可能是开放大学走向成功的又一重要原因。

3)关于与市场关系的问题。所有的一切,归根到底都与市场相关联。这就是我们和克拉克教授讨论的开放大学与市场关系的问题。办学,其实与一切经济活动一样,都必须围绕着市场去转。哪里有商机,哪里经济活动就活跃。教育也是如此。没有教育需求的教育,是不可能获得生存与发展的。远程教育在世界范围内所以能获得迅猛发展,关键在于远程教育作为一种崭新的教育形式,可以为所有国家的国民教育和继续教育注入新的生机,而使得国家迅速摆脱教育的贫困,直至经济的贫困。但是,教育与市场的关系并非只是一种商机,更重要的是一种国家利益。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才不惜投入巨资,发展国家远程教育。英国开放大

学,我想也应该算是一种国家远程教育机构吧。在中国,有人称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就是国家远程教育机构,各地的广播电视大学也就是各地政府的远程教育机构。因为这样,所以远程教育机构必须为政府服务。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已经处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完善阶段,究竟如何处理好我们的远程教育机构与政府、与大学,尤其与市场的关系?处于市场环境下的远程教育教学机构究竟如何去适应已经建立起的市场环境?暂时的迷茫是正常的,但我们总不能因为迷茫而不去改变自己的固有思维和战略。克拉克在访谈中也说到,25年前的开放大学也曾有过类似中国的迷茫阶段,即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社会地位低下,被排挤在英国大学教育的边缘。后来,是因为他们自己主动求变,才赢得了市场,赢得了社会,最终赢得了今天的这个地位。这个求变,首先是理念上的求变。在我国叫思想解放,思想革命。在新思想、新理念的指导下,变革不适应市场需求的传统体制,创立新的教育体制,包括教学机制。近几年,中国大学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数百万,大学生就业形势十分吃紧。国务院研究中心的一位专家一语道破中国大学教育的症结:我们大学教的是社会基本不需要的,而社会需要的我们大学又是基本不教的。这就是中国教育体制与教学机制的症状。如何认识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中国社会不缺有识之士,缺的可能是与时俱进的改革理念和把职业当作事业去做的匹夫!

如上思考,是我于年前(2006-12-04)致保罗·克拉克教授的信,将其作为我们之间对话的组成部分附在最后,以此完整的体现我们之间对话的全部思想。

(文字翻译与整理:魏志慧)

Three Kind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ance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University and Market

—An Interview with Prof. Paul Clark

LU Xinmin & WEI Zhihui

Abstract: During the UNESCO Chair's Serial of International Training Workshops 2006: Case Studies of Teaching Model and Studying Support Service hold on November 15 - 18, 2006, we are honored to interview with Prof. Paul Clark, who is the pro-vice chancellor (Learning and Teaching) of Open University. Although the time is limit, he introduced the three kind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ance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government, the other universities and the market in UK separately, which will illustrate the development of distance education in China.

Key words: distance higher education; government; university; market